

新旗

第十八期

三十七年四月五日出版

定價法幣二萬元

香港太古船塢李振聲轉

香港太古船塢李振聲轉

目錄

編者的話

向日本兄弟們伸手

戰爭與革命

「憲政」呢，法西斯呢

召集普選全權的制憲會議

論史大林主義的新轉向

第四國際為史大林黨設立「情報局」

告世界工人書

中共在東北（東北通信）

蘭因

三男

劉默

鳳岡

林林

編者的話

本刊第十六期出版於去年六月，以後便因政治又動底加深和紙張印工底激漲，無法出版。十二月間，我們曾以油印出版了第十七期，雖然感情聊勝於無，但印數太少，形式太不好，油墨又太淡，以致引起許多讀者不滿意，要求我們設法恢復鉛印。油印原是暫時應急的辦法，我們在「告讀者」中已經表示希望不久將來能恢復鉛印了。這四個月，我們都在為恢復鉛印而努力。此次

幸得如願。

鳳岡同志「論史大林主義的新轉向」一文，寫得本來比平常的文章更長些，但為了這個問題底重要性，我們不願將此文分做兩期發表，祇好抽去了其他的文字，裁撤了「書評」「國際鬥爭」等讀者通信各欄，以致表現得過於單調。

在現時條件之下，不僅半月刊不可能，連月刊也不可能了。但我們下了決心務使每二個月能出版一期。總之，我們以此目標編輯我們的報紙。能否實現這個目標還須依賴讀者底同情和資助。

我們沒有絲毫基金，每期出版費用都是臨時募集的。本期募集的尚不足應付近來狂漲的印刷費，同人等左支右絀，心力交瘁，希望讀者繼續援助，湊成足夠的數目以應付兩個月後出版第十九期的費用。

- | | |
|-------|------|
| 林先生 | 二百萬元 |
| 李敬齋先生 | 五十萬元 |
| 徐高風先生 | 二十萬元 |
| 陳康成先生 | 三十萬元 |
| 桂先生 | 五萬元 |
| 齊頌華先生 | 五十萬元 |
| 朱堯先生 | 二十萬元 |
| 無名氏 | 十萬元 |
| 無名氏 | 十五萬元 |

向日本兄弟們伸手

戰後日本，完全虧了美國佔領軍的刺刀，才算將古舊野蠻的統

治階級及其制度，從工農大眾的革命威脅下援救出來。名義上要『摧毀日本軍國主義』，『分解財閥』，『確立日本民主基礎』的麥克阿瑟占領軍，實質上却徹底保育了這個軍國主義，扶助了財閥，並且鞏固了天皇制的基礎。第四國際，連牠的中國支部在內，從日帝戰敗之時開始，就竭力反對任何種類對日本的軍事占領，我們一開始就指出，這占領的目的僅僅在於維持反動，鎮壓革命；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堅決主張，並堅決相信：只有日本的工人與貧苦農民，能夠起來清算日本的軍閥，財閥以及附麗於天皇制身上的一切反動東西。可是在那時，而且在那時以後，我們的主張被一切『民主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所攻擊，我們被誣蔑為『幫助日帝餘孽』！他們堅持占領，甚至還堅持要請我們的國民黨軍隊也開去實行『嚴格的管制』！戰後二年多的歷史却已證明得連瞎子都該看得見了：美國占領軍在日本究竟幹的是什麼勾當！一切反動勢力公然在張牙舞爪了，而日本工農的鬥爭則一再遭到殘酷的迫害。去年二月一日六百萬工人的總罷工被禁止了，本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交通工人總罷工又被禁止了！日本的統治者們現在該多麼感謝為全世界『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所核准的占領軍呀！日本工農兄弟們，勇敢的鬥爭吧！反對本國統治階級，反對佔領軍！第四國際與你們同在！

戰爭或革命

人類業已面臨『戰爭或革命』，這個雙岔路口。現存的社會制度若不推翻，全世界，至少其中若干重要國家，若不實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則無法避免世界規模的大戰爭。三十年間，我們已經經歷過兩次這麼大的戰爭了；第二次大戰剛結束不久，第三次大戰又提出於人類面前。

早在一九一五年，列寧就向我們提出這警告了。三十多年事變一天比一天更加證明這警告底現實性。第二次大戰剛結束時，還有人抱有幻想，以為無須革命仍可避免往後的戰爭，至少推延第三次大戰至相當長久的期間。這幻想不久就被事實所打破。雖然如此，但自從『和平』以來至今三年間仍未曾像最近一個月般把戰神嘴臉如此醜惡地顯示給我們看的。

以前，兩個陣營底當權者至少口頭上還要粉飾『和平』，現在則公開說出戰爭不能避免了。人們公然為戰爭而締結同盟。『捷克政變』、『五國聯盟』、『蘇芬談判』、『十六國會談』、『特港交還』、『西德合併』以及在準備中的『意大利選舉』，在一個月時間先後演出，沒有一個事件不是表明戰爭又向前走了一大步。

比以上種種事件更重要的，還有各國羣衆性的革命性的行動底消沉。

難道人類不久又要遭遇這種大劫麼？果真沒有避免的可能麼？我們還不可如此斷定。歐洲，戰後復興的羣衆運動尚未會重被壓下去，從去冬注意在工人來尚能走上革命道路。以社會主義革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仍是人類所應努力和所能努力的目的。

此外，上次戰爭結束至今才有三年，雙方戰爭準備，尤其蘇聯方面的準備，尙未充分，不管局勢如何嚇人，雙方仍有妥協一個時候的可能，我們還能看見第三次大戰以前的『慕尼黑』。這個猶豫期間，可以給革命利用來發展自己的力量，祇要有個真正的革命黨存在和強大。

人類面臨着『戰爭或革命』雙岔路口。

但有人反對我們這般提出的問題。他們認為美蘇兩大陣營的戰爭，本身就是革命，蘇聯戰勝就是革命勝利，而現在蘇聯在歐洲及其他世界部分的擴張也就是革命勢力的擴張。

我們反對這個說法。蘇聯，不錯，還保存着十月革命遺產，還是工人國家墮落下來的，憑這一點，牠比一般資本主義國家更進步些。但是現任，官僚統治本身已成爲十月遺產最大的敵人了。蘇聯向國外的擴張，除了極少數情形以外，決非向國外推行十月制度，決非援助各國羣衆去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到處壓制羣衆底直接行動，到處保存資本主義財產制。蘇聯把那些『新民主主義國家』，即那些衛星國，僅僅看做未來大戰用的戰略基地罷了。以這種擴張來保衛十月遺產，是南轅而北轍。因這種擴張引起大戰，是與革命風馬牛不相及的。

(蘭因)

「憲政」呢法西斯呢？

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政府規定召開『行憲的國大』，三月二十五日國民黨的立法院通過了『特種刑庭組織條例』。二事發生，前後僅去四日，可謂相映成趣。

當此案在立法院討論之時，有一位立法委員起來反對說：他有三個理由不贊成特種刑庭的組織，『一，違反憲法中保障人身自由的規定；二，司法權不容重劃分裂；三，我們既以民主號召，就不應再有這種法西斯的制度』。

話說得很不錯，只是他弄糊塗了一點：『民主』原不過是『號召』，而法西斯本來是現統治的實質呀！

虧了這個公開的『墨索里尼辦法』（立委劉不同語）的實施，欽賜的『憲法』的偽善總算給全部揭穿了！

再，在『行憲』之前一個星期，甚至在『特種刑庭法』通過之前二天，上海法電以及其他公用事業中由工人選舉出來的許多工會人員，就被以『共匪』的罪名逮捕入獄，且送『特種刑庭』審判了。如此『行憲』！如此『法治』！真是『侮辱了人們最低限度的理性』！

我們反對偽善的『憲法』，我們反對狎獮的『緊急治罪法』與『特種刑庭』！我們要爲人身的確實保障與一切民主權利的真實獲得而奮鬥！

(三男)

三月二十六日

召集普選全權的制憲會議

國民黨費力排演很久的『行憲國大』一齣戲現在總算正式開幕了。這是清末以來中國所扮演的無數民主把戲之一；而就其召開前夜的冷落情形看，竟可說是此類把戲中最沒精彩與最被漠視地一幕。過去，無論那一次『憲政』演出，無論牠是多麼地虛偽與醜陋，却總能引起許多波瀾，甚至引起某些人們的天真的期望，至少，也總能得到廣大羣衆的反對的；可是這次將使中國踏上『真正憲政之路』的『國民大會』，却是意外地寂寞，出奇地冷淡，牠的舉行簡直是沒有得到什麼人的注意。沒有一方面看重牠，沒有一個老百姓對牠發生一點幻想，甚至，最可憐的，連那些玩着這把戲的國民黨高級人士，也是興致索然，公開或半公開地表示着這個『國大』絲毫不能解決問題。

那末爲什麼要召集牠呢？

第一，當然要對美國交代。人們想以此粉飾民主的招牌，想以此表示『政府基礎的擴大』，想以此替貪污的統治接受美援與負擔浪擲美援的責任。可是這個交代太壞了，民主的把戲演得太拙劣了，所以『召開國大』與『實行憲法』，雖在好大範圍內出於美帝國主義的援意與導演，但現在却連導演者都對牠冷淡了，不好意思大捧場了。

第二，國民黨想團結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力量，結合小資產階級

的羣衆與民主的旗幟之下，藉以對抗那領導了貧苦農民的中共的政治進攻。這一點，則將證明爲毫無結果的。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太薄弱，太反動，牠無論在那一點上都不能改善一下小資產階級的地位，因此，國民黨無論用什麼方式想爭取廣大小資產階級的擁護都是不可能的。空洞的「民主的」把戲更不能盡這個作用，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羣衆對國民黨所能給予的民主恩惠的教訓，二十年來已經受得太多了。

但雖如此，我們却不想說，也不能說，正在召開的國大是一無作用，絕無影響，所以隨牠去好了。我們不能這樣想，也不該這樣想。目前，國民黨的統治固然是處在最艱難的境地中了。軍事，政治與經濟的局面，無一不使牠垂垂欲倒。但是，如果廣大的民衆不起來，尤其城市中工人階級以及一切貧苦大衆不起來，與國民黨算賬，則雖有史大林黨領導下的農民戰爭，國民黨也還是不能倒的。同時，國民黨在美帝國主義與本國大資產階級及地主們的支持下（即使是表面不熱心的）之下，靠着一些民主把戲，還是能度過難關，延續生命，維持其反動統治的。

因此，我們趁這時機，一定要再度提出我們一再提出的中心口號，讓中國的各被剝削與被壓迫的階級，一致起來，反對國民黨導演的國民大會，取消一黨一僞憲，以平等普選產生新的全權的制憲大會，重新制定人民的憲法，並成立工農政府，解決目前的一切問題。

（劉默）

（上接十六面）立下他的基地了。

農民革命的勃發，擴張了中共的軍事實力，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存有這樣的幻想：以爲中共實力這樣發展下去，一定可以把資產階級政權打倒。機會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的份子，是可以存有這種幻想的，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者，他很知道農民不是一個階級，散漫

保守，意識落後，不能有獨立的政治立場，在過去的歷史已充分告訴我們，他們不是跟着資產階級走，就是跟着無產階級走。目前中共所領導的武裝農民，縱使一時能使國民黨軍隊潰敗，但絕對不會對中國的無產階級有什麼利益的。中國是金融寡頭的社會，金融寡頭的政治資本是建築於大城市身上的；更由於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尤其依附于美國的國家，他的政治資本，又聯係建築於華爾街的主人身上。所以非給大城市以致命的打擊，或華爾街主人本身發生革命，是很難把國民黨打倒的。而這就非無產階級革命不可，一切在鄉村流動的鬥爭，除了更加深社會生產力的後退之外，是不會有什麼意義的。在東北我們看到，戰火所到的地方，道路橋樑被毀壞，工廠停閉，礦場破壞，城市成廢墟，農田變荒蕪，從前是全國交通最暢達的東北，現在變成寸步不能行，從前遍地是大豆高粱，現在則禁止在城市三十里以內種植；從前煤礦大量的出產，現在則雪地寒天無煤燒；……東北的社會生產力大大的倒退了，民衆的生活水準更嚴重而惡劣了，從前最壞的是吃的高粱米，現在起碼的是高粱麵攪米糠。這樣悲慘的生活，國民黨統治下的領域內很普遍，而中共的解放區裏，也不見得好得多少。據松北逃出的難民說：「解放區裏愈鬥爭愈窮困了」。他們的話有時是帶有色彩的，但這句話顯然是真實的。壯年人爲了保衛民主政權，參加軍隊作戰去了，勞動力一天天在減少；同時民主政權所得有的物資財力，在沒有年限制的斷斷作戰之下，也一天天的臨近枯竭。蘇聯內戰僅四年，而且是傾全國的人力物資，是澈底實行軍事共產的，到最後也弄得精疲力竭。目前中共政策不澈底，又值此長期抗戰之後，經濟那能不一窮困過一天呢？

以上所說，自然是根據『土地法大綱』實施以前的材料。下次，將彙集實施以後的材料再寫一篇通信。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

論史大林主義的新轉向

一九四七年秋天，九十月之間，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有了一次新轉變：從『減租減息』到『平分土地』，從『培植民主派』到『批判中間路線』，從『民主和平』到『戰爭勝利』。這個轉變是相當大的，牠於中國今後政治的推移有着密切與巨大的關係。因此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對牠必須有一番及時的認識與深刻研究，以便明了其原因，把握其意義，估計其影響，然後確定我們對牠的態度。

首先讓我們提出一個問題：中國史大林黨爲甚麼要有這次轉變？在共產黨自己的文件裡，我們找不到對這問題的滿意解答。一九四七年雙十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頒發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澤東的政治報告，乃是有關於此次轉變的兩個主要文件。可是這兩個文件，對於爲甚麼必須改變政策的理由，可以說沒有提到。『土地法』的決議裏只說到『中國的土制極不合理的』，毛澤東則說：『日本投降以後，農民迫切要求土地』。前一個說明不帶着時間性，牠只指出了中國土制之必須改變，並不會說出爲甚麼必須在此時改變；後一說明則根本站不住；因爲在日本沒有投降之前，農民原也『迫切要求了土地』的。那末爲甚麼一定要在一九四七年十月間，宣佈土地改革以及其他的『左傾』政策呢？同時中國共產黨自己，爲甚麼不把這個原由明白地宣佈出來呢？在這裏，中國共產黨是有難言之隱的。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處處表示着是『中國人民大眾的黨』，是完全以他們的利益爲自己政策的指標的。可是事實上，這個黨，和世界上其他各國的共產黨一樣，都是在莫斯科官僚的直接指揮之下，主要代表着克林姆

宮巨頭們的外交利益。他們之代表各該國『人民大眾利益』只當這利益不和克林姆宮的外交利益相衝突的時候，同時，只爲了不在相當限度代表羣衆的利益，他們將失去任何力量的泉源，將無法替克林姆宮服務之故罷了。自從一九二七年，史大林一系的官僚們控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來，各國共產黨每一重大的政策改變，都極其明顯地跟着莫斯科外交政策走。各國共產黨政策的『左傾』或者『右傾』完全要看史大林政府與各該國統治者關係的敵對或者合作而定。各國共產主義運動捏在史大林與莫洛托夫們手裏，完全被當作了與各國資產階級從事外交買賣時候的零找錢。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蘇聯因爲中國革命與英國大罷工的失敗而完全陷於孤立的口號，以便以『左』的恐嚇讓世界資本主義就範，結果促成了德國希特勒的上台，大大削弱了各國共產主義者的力量。在突然興起的德國法西斯勢力的威脅之前史大林於是不顧一切地向『民主』資產階級投降了，故自一九三四——三五年以後，史大林叫全世界共產黨，進行與資產階級合作的『人民陣線』政策。他以各『民主』國家共產黨對資產階級服務爲代價，換取民主帝國主義者和蘇聯合作以反對德日意的法西斯勢力；結果，斷送了西班牙，法蘭西等國的革命局勢，因之不僅鞏固了法西斯國家的地位，而且助長了民主國家中法西斯的聲勢。於是到來了，在一九四〇年，當西特勒決心作戰的前夕，史大林黨索性拜倒在法西斯足下了，牠命令各國共產黨採取了『反對帝國主義大戰』的立場，以此來實際上幫助希特勒；然後，希特勒進攻英倫失敗，意欲轉鋒東線之時，史大林一方面看到了民主帝國主義勝利把握之增高，另一方面體察到希特

勒之野心依舊，於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又在一夜間宣佈了轉向，而各國共產黨便也跟着改變政策，從「革命的失敗主義者」變成爲「反法西斯的民主戰士」了。史大林與民主帝國主義的因緣，從德蘇戰爭起一直持續到大戰結束，中間經過了四年有餘，爲要維持這關係，史大林不僅叫各個民主國家的共產黨簡單擁護各自帝國主義者進行屠殺，抑制任何革命的運動與宣傳，而且還解散了「共產國際」，解散了美國共產黨。

在此二十年中間，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改變也完全跟着上述的世界變化。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四年是「山上無維埃時期」，這是「第三時期」政策的中文版。等到一九三五年，「人民陣線」的路向開始應用到中國來，中國史大林主義者向那與之「戰八九年」的頭號敵人蔣介石伸出了媾和的手，這只手終於在一九三六年底的西安悲喜劇中給蔣介石握上了。一九三七年的中日戰爭爆發，便予這一政策以充分發揮的機會，中國共產黨自動解除了全部政治的與思想的武裝，毛澤東叫中國工農大家「忘記十年相砍的血仇」，完全置身於昨日的「匪幫元兇」，今日的「民族領袖」的蔣介石的指揮之下了。從那時候起，中間經過短期「德蘇協定」中間的「反帝」猶豫，中國共產黨一直在中國資產階級，乃至在民主帝國主義的率領下作了八年戰鬥。這樣繼續到「勝利」以後。

戰爭結束，世界矛盾十分簡單化了。整個地球的政治地圖被染上了美蘇這兩個顏色。一切衝突，跟着德日集團的完全跌倒，便圍繞着美蘇這二個軸心呈現出來。這時候，世界「共產主義」與那以美帝爲首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便不能不有新的決定了。二者之間的關係，自從停戰到現在，美帝總是採取攻勢，而蘇聯則是防禦的。這原是勢所必然。在戰爭中美帝國主義最達到了強盛的頂點，而史大林的蘇聯，則國力本就差得多，而戰爭的直接損害又大到許多倍，所以是居於頗爲不利的劣勢的。史大林在戰爭一經停止之後，

雖然在某些近處小處與表面上採取了強硬的進攻姿態，可是在整個態度上，却是希望與美帝妥協的。所謂「民主主義」，「聯合政府」等等理論與口號，在不小的範圍內是爲了討好美帝而提出的。史大林竭力鎮壓戰後興起的各個革命的羣衆運動，拼命將牠們導入與資產階級合作的道路，這除了他所代表的統治懼怕任何革命這一點之外，也表示着他想以此換取華爾街主人們的合作乃至援助。蘇聯在戰後國防上太孤單了，在國內的困難又太大了，史大林們爲要維持其統治的存在，華爾街的善意，合作與援助，是十分迫切地需要着，而且比一切看得更高的。可是，華盛頓的謀略家雖然絕對歡迎史大林的反革命服務，却同樣絕對地見不到有任何理由要予史大林以任何便利、合作或援助。他們等到戰後第一個羣衆的浪潮已經靠史大林的幫助而得以過去，西歐的資產階級稍稍恢復了一些力量，東方的國民黨也已改善了好些戰略地位後，美帝國主義處處採取了咄咄逼人的態度；宣傳方面，從電影戲劇到報章廣播，無一不以「共」作了顯著題材；軍事方面，牠發動了中國，波斯與希臘的內戰；經濟方面，則更赤裸地用金元與物資作了競爭的工具。史大林給逼到牆角裏去了。他需要自衛，需要抵抗，這使他動用了自己的最後資本——各國工人對蘇聯與共產黨所保持的錯覺的信任。他希望以「世界革命」的魔影來恐嚇華爾街了。同時，一時被「聯合政府」與階級合作催眠了的歐洲工人階級，在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因處境的迅速惡化而重新昂揚了鬥意，這使史大林的壓制性的領導有被推倒的危險。二者連結在一起，史大林主義遂不得不有新的轉向了。五月間法國史大林主義者因雷諾廠罷工而退出了政府，這是被迫轉變的起點。九月間，歐洲九國共黨的聯合宣言，乃是這個轉變的正式宣告。新的路線是「聯合政府」，牠的行動方針還是階級合作，牠的指導意識也還是狹隘的愛國主義。不過，爲要恐嚇美帝國主義，使華爾街的主人們見到史大林黨的力量起見，他們在

相當限度內主張發動羣衆運動了。因此，也說着表面激烈的詞句，甚至半吊子地領導着一些羣衆的直接行動。這個新轉變應用到中國的史大林黨來，便是雙十節公佈的土地改革令，以及毛澤東在演說中所發揮了的路線。

因此，我們看到，中共新轉向的真正的原因，乃是美蘇關係惡化所促成的克林姆宮方面的外交攻勢。由此，我們又可以看到，這個新轉向的用意絕對不是爲了領導或發動世界革命，而只是一個姿態，想以之對抗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想以之換取後者的妥協與援助吧了。

除了上面所說的國際原因，或者外來原因之外，中共的新轉向自然還有牠的國內原因與『民族基礎』。在目前的大規模內戰中，中共要想抵抗得住華盛頓與南京的聯合進攻，要想應付這場武器懸殊的戰爭，並欲在這樣的戰爭中獲勝，那末稍有歷史知識與軍事常識的人便能夠知道，中共方面必須訴之於政治的手段。換句話說，中共方面必須靠某種較爲進步的政綱的實施，以此取得人民中極大部的同情與擁護，以此謀得兵士羣衆鬥志的提高，以爲兵源之大量開拓。中共在協商會議失敗，內戰形勢極迫切的時候（一九四六年五月）發佈秘密指示（所謂五四指示），開始分配地主土地，在大規模內戰進行了十五個月，即所謂大反攻的時候（一九四七年十月），公開宣佈了土地改革，這中間的關係是相當清楚的。

此外，我們還要指出一點，這個被國際與國內因素所催促着的轉變，爲甚麼能夠說來就來，而且事實上又顯能收預期之效呢？不用說，這裏得歸功於那個新轉向之『民族基礎』。中國的土地制度是太不合理了。牠太需要改革，尤其在長期戰爭，貧富兩極化，土地集中，農產物騰貴的時候，貧僱農的土地飢餓是達到了無可忍受的地步了。所以我們承認，中共的新轉向，在某種不重要的限度內，也多少反映着中國貧僱農們的土地要求的。這個要求，過去在

七八年『聯合戰線』的名義之下，是被中共官僚們以『托派』帽子無情地鎮壓着的，到現在，只因中國貧苦農民們的這一要求恰恰符合莫斯科官僚們的『左傾』的外交利益，才被中共重新注意起來。所以我們說，中共新轉向之代表中國貧農要求，只是在『不重要的限度內』才具有這個意義。最主要與最直接的原因，促成中共這次轉向的，當然是國際史大林主義對莫斯科外交政策的響應了！

二

其次我們將說到這個新路線的內容與意義。就中國言，這一新路線之有別於舊路線者，主要表現於土地問題上。根據他們的『土地法大綱』，中共要『沒收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同時則『承認其自由經營，買賣及在特定條件下出租的權利』，並宣佈『保護工商業者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這個辦法，毛澤東們自己很坦白地承認，目的在於產生鄉村中『新的富農』或殷實的中農。所以這不是土地革命，而是『土地改革』；這不是實行列寧在俄國曾經實行了的土地方案，而是企圖實施孫中山在中國所主張而從未實行的『耕者有其田』。雖如此，這較之於中共自抗戰以來的『減租減息』政策，甚至較之於『五四指示』中『地主得到較多土地，富農土地不動』的『土改』；總不失爲一個『轉變』了。我們承認這個『轉變』，我們却必須細細研究這個『轉變』。首先我們要探究牠是否真轉向左邊了，是否真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了，有如許多天真或不天真的史大林主義的同情者所相信的。不用說，無報償地沒收地主與富農的土地是進步的，革命的，牠與減租減息的改良政策不可同日而語。然而這不過是問題的一面，而且是屬於消極的一面。問題的另一面，也就是積極的一面，乃在於這個革命的行動究竟是爲了甚麼？以及牠走向何處？後一方面比前一方面更重要，尤其是當這土地改革運動處在一個社會主義

政黨領導之下的時候；更尤其當目前這時代，資本主義及其在城市與鄉村的代理人都徹底地成了反動的時候。如果說，這個「反封建」的革命是爲了發展並鞏固資產階級；如果說，完成這「革命」的結果是資產階級在鄉村中造成了更堅實的同盟者與支持者，因之使無產階級的革命又而得不到農民方面的援助，那末，這個運動的結果將是一個美麗的騙局。現在中共新土地法究竟有利於誰？牠將走向何處呢？法令本身與毛澤東的演說講得清清楚楚：牠有利於資產階級——所謂「新式富農」，牠將走向「新民主主義」。這，如果依據我們上面的論斷來說，中共的土地改革的積極意義，只不過是一個「美麗的騙局吧」了。

且讓我們說明爲甚麼這是騙局。不過在說明之前，再讓我們用簡單幾句話，說一下「新民主主義」的特點。所謂「新民主主義」是此次戰爭中產生的一種特殊類型的改良主義，牠符合於蘇聯官僚的國內國外的特殊地位。尤其當希特勒在東線失利，紅軍追蹤越出了蘇聯疆界，克林姆宮需要羣衆支持而害怕羣衆革命，防範資產階級而必須聯絡資產階級，敵對帝國主義而勢必緩和帝國主義；這時候史大林們更加需要「新民主主義」了。因爲這是一個十分巧妙的公式。牠能夠應付這個矛盾局勢。「新民主主義」在工農大衆看來不是舊資本主義；在資產階級看來不是社會主義；在帝國主義者看來則不是蘇維埃政權的國外輸出。這樣，牠能取得三方面的免強容忍，又能滿足蘇維埃官僚的勢力伸長。因此，許多「新民主主義」國家在東歐先後成立了。牠們具備着同一面貌：共產黨的警政大權，加上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重要工業的國有化，土地的富農化。

史大林主義的這一政策，對於革命者方面來的責難，時常有如下辯解：新民主主義的主要任務是要工人與進步資產階級聯合起來，肅清落後國家的落後關係，提高生產力，然後在共產黨占控制地位的政府的領導之下，保證國家走向社會主義。

目前中共在中國實行的土地改革，實際上就是東歐國家「新民主主義」政績的移植。牠所依以實行的那套理論，或毋寧說，那套辯解，也與東歐國家的並無二致。因此，我們要批判中共的土地政策，只要批判一般的新民主主義。不過在這裏，我們自然只將以批評這個主義中的土地政策爲限。

首先我們要問：在目前這個時代，經濟上是財政資本控制了整個世界，因而資本主義關係支配了落後國家的經濟命脈，同時政治上無產階級革命成了歷史前進的主流，因而各式資產階級願意與任何落後的反動勢力相結合而予以抵抗。在這樣的時代裏，在那些落後國家中，能不能有一個鄉村的資產階級發生出來，並且在利益上願意用革命手段推翻反動的封建勢力呢？絕對不能有！這不但因爲在如此這般的條件之下造成不出「進步的」與不帶「封建」色彩的富農，而且因爲那些「封建地主」被迫去適應世界市場與本國城市的資本主義的需求，因而在或揮程度內資產階級化了。中國，與其他的所有落後國家一樣，是不會有利益上整個對立的地主階級與富農階級的。因此，任何路線，想擁護富農去打倒地主是行不通的，實質上是幫助地主的。

史大林主義的中國革命觀，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性」的學說，其根本錯誤便在於牠認中國的「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級，前者反動而後者進步，前者該被打倒而後者應予以扶植。由於這個根本錯誤的認識，史大林主義者二十年來，總是不斷的替資產階級服務，間接也就是替「封建地主」效勞。他們用這錯誤斷送過中國的第二次大革命，他們因這錯誤使中國深厚的土地革命停頓於中途，而現在，他們又在用這錯誤使中國的貧農鬥爭在開始便踏入了迷途。

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所發的「指示」中，公然規定着：「地主得到較農民爲多的土地財產，富農的土地財產原則上不

動」；這規定非但保護富農，而且左袒地主。這兒非但談不到革命，而且也說不上改革。這不是「共產主義黨」的政策，而只是「開明地主黨」的辦法。但雖如此，這兒還是明顯的受着那個破產理論的指導，就是只分地主土地，不動富農財產，因為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

可是事實總是比理論強有力的多。中國二十年來的土地鬥爭明白昭示我們：貧僱農們不動則已，一動起來，則無法限制在專反地主這一個人為的圈子內了。如果領導者強迫貧農不反富農，則對地主的鬥爭便沒有力量，土地鬥爭便不能達到深厚廣闊的規模。這一點情形，其實毛澤東們是比任何人更知道得清楚的。因為二十年來的農民鬥爭始終處在他們的控制之下。他們在江西時代，曾經為事實所逼，不顧「資產階級民主性」的規定，而逕自容許了反富農的鬥爭的。在延長十年的合作政策之後，他們現在又容許了土地鬥爭了，雖然「原則上」很謹慎的保護着富農，可是「實際上」不用說，這種保護是不會有效的，除非中共決心把反地主的鬥爭也重新鎮壓下去。因此，隨着國際史大林主義的「左轉彎」，中共的土地政策也不得不有新修正了。根據土地法：富農不得分配較多於每一農民的的土地，並且徵收富農的多餘牲畜，農具，房屋，糧食及其他財產。這很顯然，富農的「土地財產」也被碰動了。換句話說，鄉村的半無產者與貧民被允許去侵害鄉村資產階級的財產了。這是什麼革命呢？難道還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嗎？毛澤東們的回答是：牠仍舊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註：有一些社會主義者不同意毛澤東的說法，認為中國未來革命一開始雖然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可是發展下去是社會主義性的。其實這說法沒有比毛澤東前進一步，因為他們同樣不懂得一個革命之為資產階級民主性或社會主義性，主要的決定關鍵之一便在於專反地主或兼反富農。）那末反對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這說法將如何自圓呀！很方便，毛澤東

在富農上面加上了「舊式的」形容詞，說他們是「半封建的」！因此他更進一步說：「土地革命後農村中必然發生新的富農」。如此，毛澤東們用了「舊式」與「新式」這兩個混統圓滑的形容詞，在真實的社會主義性的農村革命之前，搶救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破產理論」。

不過問題的整個不幸却不曾因這種修辭上的手法而有所補救，恰恰相反，事情是更壞了。史大林主義的新的「向左轉」，完全被這樣解釋弄成爲一個陷阱了。反對舊式富農爲的要造成新式富農！什麼叫做新式富農呢？當然，史大林主義者能夠依據着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向我們說教道：新的富農是農業企業家，他不從事於半封建剝削，他不放高利貸，他只取平均利潤，他能以合理條件及合理工資僱用勞動。可是中國能造成這樣的鄉村資產者嗎？怕只有白晝做夢的人才會說可能的。在目前的國際與國內條件之下，無論那一政黨或那一政府當權，只容許富農在鄉村中存任，則總不會有一種比現有富農「更合理」或「較進步」的「新式」富農造成出來。所以「新式」富農根本就是「舊式」富農，所以中共的土地政策只是要「打倒富農爲的造成富農」。充其量不過使原來屬於一些較愚闊的富農的土地財產，經過一些轉折之後，移入另一些由地痞流氓暴發而成的較狡猾的富農之手吧了。列寧在三十年之前的俄羅斯的土地法令中（那時候列寧認爲尙處於十月革命的民主階段，因而是不反富農的），開宗明義就說：「土地不得出賣，租借，抵押，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割讓。」這爲的什麼呢？爲的是：即使任工農政府之下，如果保護富農並承認其有「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之權」，則也不會有一好的「新富農」出來，而只能讓地主階級借屍還魂，吞食土地革命的一切成果。可是現在的史大林主義者完全不懂得這點道理，或者，正確些說，叛棄了一切革命學說與傳統，竟致

在中國的土改革命中，主張打倒富農而同時扶植富農！

由此可見，中國史大林黨——其實連東歐的史大林黨在內——以造成新富農爲目的的土地政策，是一個大大的騙局。而中國史大林黨以土地改革爲中心號召的「新轉向」，亦是一個大大的騙局！

三

至於在毛澤東的報告中再加確定了的對城市資產階級的政策，則中國共產黨在此次「轉變」中並無任何轉變可言。牠的經濟綱領，除了上面所說的土地改革外，便是打倒官僚的壟斷資產階級，保護「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對於這兩點，我們曾經在許多其他文件中批評過。我們不預備在此地多所重複了。史大林主義者企圖在中國尋找出一個「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可以參加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這個企圖的虛幻性與反動性，在過去二十年中已經有了不少次証驗。現在我們似乎已用不着和牠作理論上的爭辯了。自然，在別的合適的機會，我們也仍舊要作這種批判的。不過我們現在要談到另一個問題，就是要談到中共在此次「轉變」中特別着重指出的如何實現這二個綱領的方法。毛澤東在報告中說得極其分明：中共要用「勞資兩利」的方法。保護民族資產階級，以「國家接收」的途徑消滅「官僚的壟斷資本」。可見無論在前一或後一場合中共都不願有工人階級的直接行動，不願訴之於羣衆的階級鬥爭。所以在毛澤東此次所謂的「總目標」中，特別能讓人看出史大林主義的官僚主義與機會主義的特性。「共產黨」不代表任何階級，而是超出於一切階級的。牠並不特殊地代表某一種階級的「私的」利益，而是代表「國家」的「公的」利益。因此，牠毋需要依靠勞工階級的支持，毋需保障他們的利益，毋需發動他們的鬥爭，單憑「共產黨」的官僚們操縱運用着各階級間的衝突與一

致，利用任何勢力走上了政權，掌握了國家，便可以實現「新民主主義」，並由此走向「共產主義」了。可是脫離了，甚至背叛了工人階級的目前利益與歷史利益的「共產主義」運動，不能不成爲莫斯科官僚的簡單工具，同時在某一意義內，不能不成爲各國資產階級的工具的，儘管這些黨是左翼或是右翼。中國共產黨在這一點上也走着世界史大林主義的同一道路，犯着同一的罪惡，而在此次「新轉向」所揭示的總目標中，更十分顯著地表明了這個罪惡。

誠然，史大林黨階級合作的機會主義，以及他們超越階級的官僚主義，絕對不是始於此次「轉變」。史大林黨的這兩種性質，經過了漫長二十年的演變，業已徹底完成了。現在我們特別在此地指出來，與他們的「新轉變」聯合着指出來，只因爲這個「轉變」帶着「左」的姿態，牠在許多真誠的工人革命分子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種史大林主義「從新革命化」的虛偽印象，因此我們必須指明：「左轉彎」以後的史大林主義，仍舊和牠穿着極右的外衣時候一樣，絲毫也不會回返到革命的階級鬥爭的道路上。

四

中共的這次假左傾，除了「土改」以外，又在其對「中間派」及對內戰態度上表現出來。過去，在各黨各派大團結及「民族統一戰線」這個口號下面，中共拼命拉攏了，甚至主動創造了一些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團體。爲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曾不惜以種種方法壓制羣衆的鬥爭，犧牲革命利益，竭力替這些政派散佈幻想，培養威望。現在，在「新轉變」之後，中共在這方面也開始有所更張了。毛澤東在演說中公開發佈了「中間路線」破產；「共產黨」系統的刊物上不斷地在批判施復亮，暴露朱學範，打擊馮玉祥。這轉變，據毛澤東們說，是由於國內政局使然。從抗日戰爭到「勝利」直後的和談，從和談到內戰爆發，從守勢內戰轉入攻勢的

內戰，其間中共政略有相應的改變，自屬當然。不過這還只是一方面。比這國內因素發生更大作用的，當然是世界史大林主義『向左轉』的這個總的國際因素。自從『九國宣言』發表以來，史大林主義在歐洲與第二國際的社會黨翻臉，在美國與改良派的工會官僚決裂，在中國對『中間路線』清算。這不過是整個路線在各個個別國家中的具體表現吧了。

我們從來反對史大林黨的破產的『人民陣線』政策，我們從來反對他們跟在那些工賊，資產階級『左翼』騙子，甚至失意軍人後面，欺壓工人，愚弄羣衆。我們從來以真名稱呼實物，將原形還給妖孽，因此，我們從來針對着史大林黨的誑騙，叫工人們看清楚那些工賊，騙子與軍閥的嘴臉。可是爲了這，史大林黨曾經聯絡了各型反動腳色，將成噸的污泥傾倒在我們的頭上，說我們替反動派効了勞。現在情形一變，史大林黨却自己重復着兩三個月前我們的批評，他們自己也說這些工賊，騙子與失意軍閥並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反動派實際上或客觀上的幫助者了！來得多麼恰好的一個對照！過去二三年中跟在史大林黨背後一切深信着『中間路線』的民主派知識青年，現在該可以拿我們過去的批評，史大林黨對我們的攻擊，與他們最近的言論作一番比較研究了吧！

不過如此說，我們絲毫不曾含有這樣的意思：史大林黨『轉變』後的政治綱領已經和我們的相一致了，因而是正確的與革命的。絕對不是那麼一回事！轉變後和轉變前一模一樣，牠們和革命政策之間的距離仍舊是那麼遙遠的。他們過去和中間派親熱固然違反羣衆利益，但目前的決裂却也不是爲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好處。他們過去的聯合是受命於蘇聯官僚，而今天的翻臉也出於克林姆宮主人的指使。這樣的變來變去，當然始終變不成正確的或革命的。

史大林主義二十年來所犯的無窮錯誤，在政略方面，主要就是表現在對『中間派』的關係上。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

對於史大林主義的批評，也一大部分有關於這個關係。所以要認識史大林主義在這問題上的新態度，我們得約略說一說牠二十年來對『中間派』所取態度的演變。

所謂『中間派』，普通乃指第二國際的社會黨，各國改良主義的工會官僚，美國之類國家中的『進步份子』，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等等。總之，是一些小資產階級上層與資產階級『左翼』的政客和他們的團體。史大林主義的起始發源，在不小的意義內說，竟就是這些『中間』傾向乘世界革命停滯之機，在布爾雪維克主義隊伍中的借屍還魂。所以史大林主義和這些『中間派別』，在維持反動與鎮壓革命的歷史專業上，總是相輔相成的。今天史大林主義實在是『中間主義』的主力，他的作用還超過了其他所有的流派，牠以最大力量，最大成效，替帝國主義與蘇維埃官僚統治控制着，與彈壓着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但雖如此，史大林主義由於牠存在的根基不同，畢竟與其他類型的中間主義不同，史大林主義首先是蘇聯官僚層的產物，因此，在歷史的地位上，牠雖然居於帝國主義的反革命與社會主義的革命之間，但在現實政治中，牠爲了這第一重要的官僚利益，時常合縱連橫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由此發生了牠對其他『中間派』的時離時合關係。從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是『合』的時期，這期間史大林主義與英國工黨，蘇聯富農及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手攜着手，斷送了英國大罷工與中國革命，毀滅了世界革命的主要武器——布爾雪維克黨的傳統及其幹部。其結果，帝國主義的力量在全世界愈趨鞏固，牠對蘇聯的壓迫更趨積極，危害到官僚本身利益了，於是在一九二八年之後開始了史大林主義與『中間派』的『離』的時期，在此期間，史大林主義將一切『中間』政團及其羣衆稱爲『法西斯主義』，宣佈工人階級中的右派乃是共產主義者的主要敵人；這樣，在慌張失措、狼狽驚恐之際，破壞了德國最有利的革命局勢，造成了真正的法西斯，使

人類無可避免地走上一個新的大屠殺；結果，法西斯與戰爭的直接危險使史大林發抖了；於是，在一九三四年，希特勒上台之翌日，便向昨天罵之爲『主要敵人』與『法西斯』的『中間派』無條件投降，又來了新的『合』。這時候，史大林主義打出了『人民陣線』的新旗幟，以一種比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機會主義更無恥的方式，去聯合『中間派』，甚至去造成『中間派』。牠以此破壞了西班牙的革命，也以此放過了法蘭西的革命，結果，『人民陣線』被證明是幫助法西斯的最好方法，於是任一九三九年，史大林主義對『中間派』又來了一次新的『離』，牠索性奔入帝國主義的『極右翼』——德國法西斯的懷抱中了；不過等到事實證明帝國主義的『左翼』更加有力的時候，史大林主義立刻又回頭了，回頭來跟『中間派』作第三次的『合』，牠們『合』在一起，統戰時期，很努力與很有效地替『民主』帝國主義鎮壓了後方，支持了戰爭。戰勝之後，史大林主義仍舊與『中間派』『合』着，合作欺壓了戰後發生於世界各地的革命的羣衆運動。這個『合』，一直維持到去年九國宣言，我們才看見了新的『離』的現象。

略觀以上所述，無論『合』也好『離』也好，史大林主義對『中間派』的政策，從來不曾有利於無產階級的革命，甚至也不曾有利於民族解放運動的。爲什麼會如此呢？原因自然很多；不過歸根結蒂，一個最主要的原因，乃在於決定史大林主義對中間派態度的，不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爭取革命同盟者的不變要求，而老是蘇聯官僚爲對付國際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一時利益。因此，他們對『中間派』的態度是短視的，盲目的，反覆不定的，永遠在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兩極端之間跳躍的，實質上有利於反革命而有害於革命的。

中共目前對『中間派』的態度是在『合久將離』的時候了。但尙未確定，也許，牠尙在蛻化之中。不過無論怎樣變，無論離得多少遠，有一點我們是可以確定的：史大林黨在這方面決不能站在中國

無產階級與貧農立場上，始終如一地，爲爭取革命同盟者而向『中間派』政團尤其牠們的羣衆實行列寧的共同行動或聯合戰線政策。在新的『離』中，史大林主義多半要混和着過去的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而非清一色的前者或後者。這或許是不同於過去的離合的唯一之點吧！

隨『新轉變』以俱來的另一個中共政策的改變，便是『戰爭到最後勝利』的口號代替了『和平』與『反內戰』的口號。這在一方面固然反映着美蘇在遠東一時妥協希望的消滅，另一方面也表示出中共在內戰中的有利發展。不用說，中國內戰之前途，如果我們暫且撇開革命因素不談，則其是否將延續至第三次大戰，或者中途以某種方式成立暫時妥協，一切都將視華盛頓與莫斯科的關係如何而定。但是，正如我們任上期本刊上所評論的，中國的內戰，即使中共方面具有較爲進步的意義，但其持續亦於中國的革命利益有違。內戰之無限延長，勢將減損而非增長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可是沒有這後一力量的興起，中共方面的戰爭及其土地改革，便不會有勝利的前途的。我們竟可以說，如果沒有城市的工人革命，即使中共在內戰中勝利了，（這勝利其實很少可能）也不等於中國革命的勝利；非但不等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勝利，甚至還不能保證土地革命之勝利的。所以我們認爲，史大林黨之放棄『和平』口號是既幻想而又反動。他們今後之堅持內戰解決問題，是堵塞了革命的可能，同時將予國民黨以『和平』欺騙收買民心的便利。

五

對於中國史大林黨的『新轉變』，上面我們已經從各方面加以解釋與批判了。現在我們要從積極方面，站在我們中國第四國際派的立場上，表明我們對這些『新轉變』的態度：

一，努力揭穿中共『新轉變』的國際背景，說明這種『左傾』

主要是中共對莫斯科外交攻勢的一個適應，所以牠是虛偽的，易變的，不足恃的；

二，積極推進土地革命，同時暴露中共土地法令的實質上的祖護富農性；堅決站在貧僱農的立場，反對土地之自由買賣，抵押，租借，以及一切使土地重新集中的辦法；

三，積極在城市與鄉村中，尤其在城市中發動工人的階級鬥爭，反對『勞資兩利』的產業和平，以此引起革命，使土地鬥爭有勝

利與成功的前途；

四，堅決不移地站在工人貧農的立場上，批判中間派，暴露其民主的虛偽性，對國民黨的妥協性，但不反對在特定目標下與之作共同行動，以此爭取其羣衆；

五，立即停止內戰，召集平等無記名直接普選的全權的制憲會議，組織工農政府，實現革命政綱。（鳳岡）

三月一日

第四國際爲史大林黨設立『情報局』告世界工人書

一九四三年五月，當帝國主義大戰正酣時候，第三國際主席團，毫未徵求各國共產黨員意見，便決議『解散共產國際機關，終止其事務，處分其人員和資產。』

在這時期，史大林黨領導人正在與那些『民主盟國』領袖，邱吉爾，戴高樂，羅斯福一派，同渡蜜月；史大林黨領袖們當時爲了替解散共產國際做辯護，便說了如下的話：『世界各國歷史發展道路是深刻差異的』，『各國社會的和政治的發展之水平 and 制度是各有不同的』，因此產生了『千差萬殊的任務』，若想以一個國際的中心來『解決』這些任務，那就要遭遇許多不可克服的障礙。

他們又說：他方面，『在工人運動開頭幾個時期，才需要國際，現在工人運動早已發展到超過需要國際的階段了』；此次解散『正是出於各國共產黨及其領導層之政治的發展和成熟。』

以上這些可憐的論據，實際上不過是卑鄙的遁辭，爲了對世界工人隱瞞下面的事實，即：史大林久已將第三國際從世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一種鬥爭工具轉變爲隨蘇聯外交要求而向資產階級施行壓力和敲詐的一種工具了，如今連國際形式也解散了，爲了進一步求得他的帝國主義盟友放心，進一步加強與他們結神聖同盟的政策

。共產國際，於一九四三年形式上解散以前好多年，事實上已經死去了。但戰爭，以及蘇維埃官僚和蘇聯盟國共產黨所竭力推行的階級合作，『神聖同盟』，『全民一致』的政策，使得這個國際連形式的存在也成爲多餘的和有妨礙的。

可是，今天，歐洲九國共產黨諸代表在波蘭開了會，決定設立一個『情報局』，『負責交換各黨間的經驗和協調各黨間的活動。』

工人們！你們讀了這個『情報局』發表的宣言以後，請回憶一下：在此次帝國主義大戰全期間以及大戰以後的時期，史大林黨領袖們要你們採取甚麼鬥爭路線！

你們應當記得，今天暴露英美在此次大戰中具有帝國主義的戰爭目的的人，暴露世界已分化爲一邊帝國主義他邊蘇聯及其衛星國兩大對敵營壘的人，正是當初在戰爭全時期中鼓吹那與帝國主義盟友結神聖同盟政策的人；當初他們阻礙羣衆去向這些『盟友』作階級行動；他們歌頌這些『偉大的民主領袖』，邱吉爾，戴高樂，羅斯福；他們頑固地否認此次大戰底帝國主義性質，而且熱狂地攻擊工人運動中無產階級的和國際主義的傾向，即第四國際，——牠

號召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不論是否與蘇聯同盟的，工人們都應起來作革命的行動，以反對戰爭和帝國主義，以此準備羣衆奪取政權。

你們應當記得，當初，他們在美國解散了共產黨，在英國毫無保留地贊助了邱吉爾政府，在法國使抵抗運動服從戴高樂指揮。

事實上，他們今天所以記起了『各國共產黨之間若無一種聯繫存在，就會造成不利於工人階級的局勢』，那並不是因為他們果真決定拋棄那民族主義的和階級合作的政策，而是因為在莫斯科不得不進行外交的反攻以抵禦美國帝國主義日重一日的壓力中，恢復那包含諸國共產黨的國際之威嚇乃是一種重要的敲詐手段，求取帝國主義和各國資產階級底新讓步和新妥協。祇消指出下面的事實，便可知白這個『情報局』底詭詐性和機會主義性了，即是：參加這個『情報局』的，祇限於歐洲若干國家底共產黨，而那些國家又恰恰能夠障礙馬歇爾計劃實行於歐洲的，此外，這個『情報局』底綱領式宣言毫未主張恢復階級鬥爭，奪取政權，無產階級革命，歐洲及全世界社會主義合衆國，而是號召工人有一種『反帝國主義的和民主的』政綱之上團結起來，并指示共產黨現時的主要任務是在保衛『民族主權和民族獨立』。法意兩國史大林主義者早已否認這個『情報局』與第三國際底恢復有任何關係了。

對於這些熱烈保衛『民族主權和民族獨立』的英雄們，我們不能不提一點，即是：蘇維埃官僚和共產黨自身須先做一個好榜樣給人看，須先宣佈已有決心從歐亞各地撤退蘇聯佔領軍，以此尊重蘇聯所佔領和壓迫的一切國家底民族主權和民族獨立，德奧兩國也包含在內。

對於這些英雄們，我們又不能不提一點，即是：凡把蘇聯及其衛星國的結合說做『民主的』結合，爲了抵禦帝國主義在希臘等國反民主陰謀的，乃是無恥的欺騙羣衆，使之不明白蘇聯及其操縱的國家所行政制底性質。

在蘇聯，蘇維埃官僚久已實行了一種史無前例的專制獨裁的政治。

在蘇聯所操縱的國家，在民主政制外表之下，逐漸鞏固了共產黨底獨裁，這種獨裁并非以自由選舉的工農蘇維埃民主共和國爲榜樣，而是以現時蘇聯底官僚和警察國家爲榜樣，這個獨裁不過是蘇聯官僚壓迫和剝削那些國家所用的手段罷了。

對於這些英雄們，我們更不能不提一點，即是：他們現在要爲反對昨日的『民主』盟友底帝國主義政策而鬥爭，却不知道唯一的鬥爭手段乃是打擊罪惡底根源，即資本主義制度，凡帝國主義，法西斯，戰爭，都是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

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決不能在繼續神聖同盟和階級合作的政策以保衛『民族主權』，『民族獨立』這樣一個綱領上進行的，而祇能在階級鬥爭旗幟之下，用革命手段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去進行。

以此爲前途看來。歐洲和世界決不希望永遠區分爲許許多多『有主權』和『能獨立』的小國，因爲這種區分是與現時生產力底世界性相矛盾的，而這些小國事實上又不過是幾個大國底衛星。反之，我們現在一天比一天更明顯看出：若無社會主義國家間自由同意成立的歐洲合衆國或世界合衆國，人類便不能向前進步。惟有這樣的合衆國才能使一切人民自由和獨立，同時容許歐洲和世界經濟獲得真正的協調和計劃化。

資產階級已在企圖統一世界經濟和克服各國分立了，資產階級這個企圖固然沒有成功希望，但史大林主義對此企圖的反應，祇曉得緊緊抓住『民族主權和民族獨立』，而毫不敢提及歐洲和世界自由的社會主義合衆國之客觀的必需性，現在比以前更加迫切的必需性。這點，也可顯示史大林主義已墮落得如何深刻了。

工人們，你們切不可從這個『情報局』宣言中看出諸國共產黨

和一般史大林黨有甚麼真實的『左傾』，即不可認爲牠們已經恢復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前途。

史大林黨領袖們，在此次大戰中和大戰後，曾與他們今日稱爲帝國主義者的人聯盟，共同反對『法西斯』和保衛『民主』，以此使你們空過了革命機會，今後他們仍不可避免地要引導你們到新的欺騙，新的背叛，新的失敗去的。他們的目的仍舊不是以階級鬥爭奪取政權和實行革命，而唯一地是利用共產黨做工具來討價還價，蘇維埃官僚隨時都是能夠同帝國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相妥協的。

史大林黨領袖們，如果真想左傾，真擬進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那就應當停止要求參加資產階級政府，那就應當主張純然工人政黨底政府，由受羣衆監督的共產黨和社會黨執政，以實行真正的工人綱領。他們在法國就應當停止支持法國帝國主義之保留越南及其他殖民地之『法國聯盟』之內，就應當毫無保留地支持所有殖民地底完全獨立。他們應當停止向戰敗國要求賠償，停止與戰勝國底劫掠政策同流合污，停止那無差別地反對德奧民族的沙文主義宣傳。他們應當拿歐洲社會主義合衆國口號和合於羣衆真正利益的計劃化口號，去對抗華爾街爲自己利益去協調歐洲經濟的帝國主義計劃。

你們試向史大林黨領袖們要求施行這個政策看看，你們便可明白他們此次『左傾』底欺騙性，詭詐性了。

對於你們，各國工人和被剝削者，唯一的保證，唯一的希望，仍是你們的直接階級行動。今年，你們在歐洲和世界許多國家，在法，意，華，印，日諸國，曾從最基本的經濟要求和政治要求出發，從事這個行動了。這個行動摧毀着資本主義制度底基礎，開闢道路，走向革命和奪取政權去。

你們如果能夠明白你們手裏握着無可限量的力，如果有決心克服改良派和史大林派官僚領導底剝削作用，如果毅然踏上階級行動

道路，那麼一切希望都有實現可能了。

祇要世界無產階級力量未被打破，祇要你們仍在爲你們的麵包和自由而鬥爭，那麼法西斯和戰爭都是可以避免的。

世界底真正主人，既非美國帝國主義，也非蘇維埃官僚，而是你們，全世界工人和被剝削者。你們手裏操有決定之權。

第四國際是唯一的、世界革命組織，繼續着馬克思，列寧，托洛次基底鬥爭，牠現在號召你們同牠一起準備無產階級革命，這是無產階級和人類真正的唯一的出路。

史大林黨決不會恢復列寧和托洛次基底革命的第三國際，這個第三國際底原則和精神現在鼓舞着第四國際，第四國際繼承了牠的傳統和目的，即世界社會主義革命。

世界革命萬歲！

歐洲和世界合衆國萬歲！

第四國際萬歲！

國際書記部

一九四七年十月

中共在東北（東北通信）

林林

我在東北整整地一年了，我看到國民黨統治者以抗戰功臣自居，進行其劫收和壓榨的統治；另一方面，接觸到受過中共教育的松北智識青年，他們暢談着中共在東北所進的清算鬥爭事蹟。東北的勞苦大衆就是在這兩個敵對的領域中討生活，過悲慘的日子。國民黨統治下的苛厲與腐化，引致東北民衆的深惡痛絕，這是無須贅詞的。只是中共的清算鬥爭政策，是否能充分掘發農民的革命熱力，以保持其目前在東北的絕對優勢局面，並進而攻華北以至於整個中國呢？要答覆這一問題，只有就農民本身以及中共的方針

政策的實際材料，加以正確的理解，才不致流於虛幻。

中共在東北所實行的土地改良政策，直至目前為止，可以分爲兩個時期，從「八一五」日帝投降到軍調部撤銷止爲第一時期；從軍調部撤銷到現時止爲第二時期。在這兩個時期中，中共所實行的土地改良政策，就其實質來說並沒有什麼差異，所差異者僅執行的方式罷了。在第一時期中，中共的目的，僅在清算日帝滿帝的特權地產，藉以羅致一切仇日恨滿的人士和民衆，來參與他們的民主政權。日帝在東北的墾拓農場據說佔全部東北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四十六。這些墾拓農場都是強迫向農民收購而來的，像過去英國封建領主的圈地一樣。這些墾拓農場交由北海道或朝鮮移來的日人或韓人進行機械化集體耕作。這樣就形成了滿農與日帝墾拓農場的仇恨。當日帝「八一五」投降之後，中共提出沒收日帝墾拓農場，分配給農民，自然是獲得不少農民的擁護。其次是沒收滿帝的特權地產，這些地產稱「皇糧莊頭地」（或稱「掛地」），是滿帝時代收自民田，賜於功臣的。此外對於沒收土豪劣紳非法榨取農民的土地，用說服和模範作用規勸地主獻地，以及減息減租等等，在這時期也或多或少在進行着的。這樣一部份農民是獲到土地了，但大部份農民還陷于少地或無地的貧困生活中；同時，由大地主在獻地運動中獻出來的土地，大多是貧瘠或不堪耕作的。農村中貧農和佃農對於大地主和豪富之間的對立還是深刻着。這對於中共的動員農民是很不利的。隨着國共雙方軍事對立的白熱化，中共第一時期的土地改良政策，不得不受到修改，以適應動員的需要了。這就是第二時期土地改良政策的開始。

中共第二時期的土地改良政策，嚴格說來，也還去不掉軟弱與妥協的根性的。其方式除加強第一時期的沒收土豪劣紳非法榨取農民的土地，並減租減息外，就是（一）分配公地；（二）沒收地主瞞稅不報的黑地；（三）清算租息，清算霸佔，清算負擔及其他無

理的剝削，地主得出賣土地給農民，以清償其所負欠之款，或直接向土地抵償；（四）以原價或低利收回高利貸和地主利用荒年購買的土地；（五）在實行減租之後，保障農民的佃權；如地主自願出賣土地，佃農得有優先權買得此耕地等。從這些方式看來，中共的解決土地問題，是澈頭澈尾的改良方法，他們是怕用革命的方法來進行的。他們企圖用折衷的方式，使大多數農民，都變成中農；對於原來的中農，決不侵犯他的土地；不但中農，就是對於富農，也不變動其土地；不但富農，就是一般中小地主，也還照顧到他們的生活。中共的這樣做法，是以爲中國農村從富農以下，以至于貧農和佃農，都還可以構成一個階級，利害與共，合作一致的。但是在每次清算鬥爭的過程中，中共的這種見解，就被打得破碎了。農民一經起來鬥爭，就無論中共如何規定，並隨時隨地派遣幹部親自去督導，但農民總在憤激的熱情下，侵犯了富農的土地，有時甚至也侵犯了中農的土地。還有對於富紳，惡霸，在實行清算鬥爭時，原規定保留維持其生活所必需的土地的。但在清算鬥爭過程中，一般農民由於仇恨太深，不但保留給土地，甚至連他的生命也不留了。很多富農地主商人等，爲了生命，爲了安全，總是想盡方法，偷偷的逃避到國民黨軍隊的領域來；不但富農地主商人等，就連一般中產階級的人家也設法跑開了。這就形成了在長春，在吉林，在瀋陽的難民羣，牠們的數量一天天遞增着。

自從中共進行第二時期土地改良政策，各地普遍展開熱烈清算鬥爭後，雖然是不澈底的，但農民的革命勢力，已由冷淡觀望的態度，轉變成積極的行動，參加武裝的組織，來衛護他們鬥爭得來的土地了。雖然這種革命勢力還是在給中共牽着鼻子的，但這力量表現于中共歷次的攻勢中，則在逐漸增強中，試看最初一三三四次攻勢，他的力量還只能在農安德惠之間進犯，到第五次攻勢之後，就已在中長路西側，和遼南一帶建（下接第四面）